

1979年5月19日 星 期 六
农历己未年四月廿四 第 1 1 2 7 1 号

这个军的三级宣传理论干部经过一个月的学习，逐步弄清了党的现行经济政策中的一些是非问题，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他们把学习成果整理出来，对部队进行党的经济政策教育，使干部战士的思想跟上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形势。

电力工业必须变落后为先行

刘澜波

电力必须先行，这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现在全国缺电已进入第十个年头，电力由先行变成落后，工农业及人民生活用电得不到保证，经济上损失很大。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把这种局面逐步扭转过来。

怎样才能改变电力工业这种落后的局面呢？电力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呢？

首先，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上，今后若干年内，需要逐步加大电力工业投资的比重。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三年中，电力建设投资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发电装机容量少，而工农业用电却增长快了，这是造成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一九七七、七八两年情况好一点，但还远没有还清旧帐。

在今后三年期间，通过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电力工业在调整中前进，在前进中调整，缺电的紧张状况会有所缓和。但三年调整以后，国民经济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工农业用电也将大幅度上升。因此，在调整期间，就要抓紧时间使电力工业以后能够大上做好准备，否则届时还是谈不上电力先行，还会出现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失调的现象。这一点，在计划安排上必须及早注意。

第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应当多搞水电。

我国电力工业的能源政策是：水火并举，因地制宜。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要多搞水电。我国水力资源极其丰富（理论蕴藏量约为五亿八千万千瓦），已经开发的不过是百分之二点五。水力资源远比地下矿藏容易查清。有很多“富矿”，即投资省、见效快的水电资源，亟待我们去开发。据新安江、盐锅滩、新丰江、柘溪等水电站的建设经验，只要做好勘测设计等前期工作，类似规模的水电站建设期限一般可做到三、四年左右开始发电，只是稍长于火电。水电成本低，利润高，投资可以较快收回。只要国家对水电的建设项目、投资、物资安排得当，水电建设的速度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加快水电建设是缓和燃料、运输紧张的战略措施，而且是干净的能量，甚至可以提供发展旅游。因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水电投资。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如美、法、日、瑞士、瑞典、加拿大、西德等，都是优先发展水电，水力资源利用已达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第三，加速建设煤炭和电力的联合基地。火电要立足于煤，不是油更不是煤，这是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所决定的。煤、电要比肩发展，火电发

展速度取决于煤炭发展速度。今后火电建设的重点是坑口电站，要在煤炭基地建设电站群，形成大型电力基地。当然这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考虑水源等问题。为了加快煤炭和电力的建设，我们认为应把煤炭开发的重点放在那些资源丰富，埋藏浅，热量高，投资少，见效快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很多，如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宁夏等地，应加速开发；变北煤南运为北电南送，更为经济合理。煤炭部和电力部应进一步密切协作，在全国重点煤矿区建设大型煤电联合基地。

第四，积极发展大型发电机组的制造。发电设备的供应必须立足国内，自力更生为主，进口必要的国外设备为辅。目前，我国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和单机容量都偏小，电力部应与一机部紧密配合，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发电设备的引进，也要处理好“买与不买”的关系。我们应积极地引进新的技术。希望国内相应的几个制造厂通力合作，抓紧大型机组的改造和已定型机组的大批量生产，以及相应的大型发电设备的制造。这是加速我国电力建设的可靠保证。

第五，抓紧作好电力建设的前期工作，水电能否加快，尤其取决于此。

当前电力建设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前期工作落后，特别是水电。这是十年来拆散、下放、砸烂勘测设计和科研机构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大批技术人员被轰散了，大量技术资料也被烧毁了，水电建设的前期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为了扭转这种情况，火、水电勘测设计院必须适当调整、集中、充实和加强，采用先进的勘测设计手段，以加速前期工作；同时，为调动广大勘测设计人员的积极性，迫切需要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去下放、分散、改行的技术人员，希望各地区、各部门支持他们归队。

为了在深山峡谷地区进行大规模水电建设，需要提前二至三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修筑道路，运进设备，进行野外勘测工作，这是顺利进行施工的基础。不做好勘测设计，仓卒上阵，就难免在施工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做不到多快好省，这些是有过很大教训的。为保证严格执行基建程序，用于前期工作的费用，应提前拨付，在数量上要满足起码要求。根据长

期经验，水电建设项目必须有一定的“储备”，即规划、设计和施工中的项目比例，至少应为四比二比一。我们应当力争尽快达到这一目标。

第六，要搞好整顿工作，加强企业管理，充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保证安全发电、供电。

全国已有的发电设备，是我们的前进基地。这些年来，老设备由于过份使用（我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甚至还提倡什么“一厂变一厂半”，以致失于维修。新设备由于制造质量有缺陷和配套设备不全，以及上煤、除灰、供水等基建工程未完，还有一部分出力不足，经过两年的努力，情况已大有好转，我们打算今年把这部分设备的能力基本完善化。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两年干旱水枯，水电发得少一些，有的同志就说是水、火电比例失调了，火电搞少了。其实，根本问题是水、火发电装机太少了，没有一点储备。为了多发电，全国有许多水电站的水库没能合理利用，浪费卵粮，甚至在水死水位以下还长时间大量发电，浪费了很多水电，使水库失去了正常调节，破坏了综合效益，也给设备带来损失，这种做法，后果十分严重，必须下决心逐步扭转。

现有输变电能力严重不足。约有几十万千瓦发电能力送不出去。同时，由于过负荷，电压低，加大了送配电线路的损失，估计每年多损失了几十亿度电量。这都是必须加以整顿的。

严格执行计划用电。电力分配一定要从全局出发，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同类产品要择优供电。新建的项目，必须有供电协议，否则不应列入建设计划。现在很多地方由于超分、超用，使电网周波和电压下降，损坏了发电设备，损坏了用电设备，也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如果这种作法不改变，总有一天会发生电网解列、大面积停电的恶性事故。对于这种情况，请各地党政领导机关予以充分的重视，坚决制止不严格执行计划用电的状况。要狠抓节煤、节电的工作。一九七八年全国耗煤，平均每度电为四百三十四克，仅比历史最好水平四百四十二克，降低了八克，仍然偏高。我们打算在三年调整期间，经过努力，逐年降低六至七克，或者更多一些，这样每年可以节煤数百万吨。

一九七八年全国送电线路损失和厂用电约占发电

量的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十七，我们打算在三年调整期间，经过努力，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以下，这样可节约几十亿度。

各行各业都要厉行节约用电。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电力部门要抓，全党全国要抓，要发动群众抓，各地都有不少很好的经验，一定要抓出成效来。

要切实做好以上工作，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广大电力职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深入细致地进行“四个坚持”的教育，认真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敢抓敢管，狠抓队伍建设，克服无政府主义，消除派性干扰。恢复和加强培训制度，提高职工的技术、业务和管理水平，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这个任务是很大的，各级电力部门要决心下大力气，依靠群众，扎扎实实地一件件办。

最后，谈谈加强电网的统一管理问题。

发展电网。电网愈来愈大，（产（发电）、供（送变电）、销（配电营业））高度统一管理，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西欧、东欧的电网都已跨过国境。我国建国以来，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实践证明，不论大范围、小范围的电网统一管理，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好处：按照经济地理状况，合理利用能源，互相补充；充分发挥设备能力；加快建设速度（创造了使用大机组的条件）；降低燃料消耗，保证安全发电、供电；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互相支持；在战时受到破坏时，也可使电源恢复较快。林彪、“四人帮”以批判“条条专政”为名，否定大电网的优越性，破坏大电网的集中统一管理制；又由于各地区严重缺电，有的电网被拆散了，一些电网管理削弱了，给电力工业和用户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一九七五年国务院明文规定电网统一管理，这完全合乎经济规律的。由于遭到干扰，这个正确的重大措施未能得到贯彻实行。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国务院文件所规定的原则，应当认真贯彻执行。最近国家计委提出的“跨省区的和一个省区范围内的电网由电力部统一管理，电力由国家统一分配供应”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在有关省、市的协助下，电力部门应当管好电网，把两个积极性拧在一起，把事情办好。

我们相信，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广大电力职工的努力，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同心协力，坚持四个原则，解放思想，走中国四个现代化道路，在新的长征途中，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电力工业一定能够变落后为先行，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还是搞多面红旗、流动红旗的办法好



最近，河北省正定县一些基层干部提出这样一条建议：今后在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还是搞多面红旗、流动红旗好！

这条建议是他们总结了过去学先进的经验教训，讨论如何改进领导工作方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时提出的。县委书记苏立道说，运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这是我党多年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批示过许多先进典型的经验，在全国各地树立了多面红旗。那时，由于先进典型是多方面的，红旗又遍及全国各地，大家因地制宜学先进，点上的经验很快地在全市开花结果了，有力地推动了合作化运动。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先进单位到处都有，有这方面先进，有的那方面先进，有时今天先进，后来别的单位又超过了他。为什么要把红旗搞成固定的不搞流动的呢？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把先进典型固定化、全能化、神秘化的危害。这个县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队，原来是个科学种田、粮食高产的先进典型。开始，县委因地制宜地推广它的先进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后来被上级领导树为全县、全地区的一面红旗，并派工作队常年在这个大队蹲点。结果什么运动来都让三角村带头，什么外地的“新经验”、“新套套”都要通过它试行推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一看三角村是领导抓的点、树的旗，也都纷纷来学，不顾实际情况如何，千方百计地搜索材料、“总结”经验。于是，这个科学种田的典型，就成了一好百好、包罗万象的“全能典型”。它干什么，人家就得跟着学什么。这样，不仅使这个典型不能充分发挥原有的模范带头作用，而且给面上的工作也带来了损失。

城关公社书记翟学增说，把先进典型固定化、全能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就一个县来说，各个社、队的政治、经济情况、自然条件也不尽相同。三角村大队地处正定县中部，人多地少、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而座落在北部老定县故道上的六个公社，则是风沙地带、水肥不足。过去，这六个公社在生产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盲目地推行三角村间作套种的经验，结果收效不大。后来，县委组织他们学习当地西里双大队营造防风林、治沙改土、大搞水利化的经验，很快使这里的沙地变成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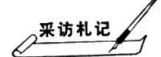
三里屯公社书记张文才说，先进典型并非一切都要先进，一面红旗再好也有局限性，多面红旗才有代表性。况且，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搞流动红旗才符合辩证法。从

全县来看，有不少大队某个方面的经验都比原先树立的先进典型先进，有的大队在劳动生产率、农业纯收入等方面，已经超过了先进典型。可是，过去介绍各个方面的经验的现场会都到先进点上去开，结果大家都不服气。如果今后树立先进典型，不搞固定化的，而搞成流动的，谁先进就学谁，哪个方面先进就学那个方面，实事求是，大家就能从各个方面学到真正有用的经验，形成互相促进、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三角村大队的干部社员对只树他们这面红旗，意见也很大。前些年，这个大队的上级领导、各个部门的领导来往不绝，今天作指示，明天提建议，搞得无所适从。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期，什么“大批”、“堵路”、“割尾巴”，事事都要带头干，受害就更大。同时，这几年还参观成风，三角村大队每年小麦从扬花到黄熟，棉花从伸枝展叶到挂桃开花这个期间，每天参观的人最多达一万多人。繁重的接待任务给这个大队带来了沉重负担，有时连农事活动也不能正常进行。这个大队的干部、社员说：这些年来俺们吃够了当全能典型的亏。今后，还是搞多面红旗、流动红旗好！

新华社通讯员 谷志文 王贵海
新华社记者 侯志义

宋朝《二程全书·遗书二上》记载有“谈虎色变”的故事，说：“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最近，记者在云南省楚雄县农村采访，听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并且叫它“谈马色变”呢！事情发生在红旗公社车坪大队。一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六十条》），文件一读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中央的文件“是本好经”，句句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有的说：只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去办，农村一定会很快变样。但是，当讨论到允许社员养马的问题时，“众莫不惊”。有的说，这是过去批判了的东西，现在又拿出来，是不是太右了？真是“谈马色变”，可是为什么会“谈



马色变”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一九六五年，车坪大队的三个共产党员私人养的马生了骡子。这个把骡子卖了盖起新房。就这样，三个党员成了“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三面黑旗”，遭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帐新算，一个党员又成了“黑典型”，连大年初一那天他们都被“勒令”去接受批判。这件事，虽然时隔十多年，但至今谈起来，干部们仍然余悸未平。有的说“被整够了”，有的说“被吓怕了”。

私人养马生骡子，卖了骡子盖房子，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吗？就是“黑旗”吗？大队党支部引导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有的说：应该批，不但当时批判

大赤大队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
社员生活富裕

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社员走农、工、副结合的道路，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先后修了沙场、金属拉丝厂、牧场，还在山上发了水果、毛竹、茶叶生产基地，使大队工业、副业收入逐年上升，去年占大队总收入的一百分之六十。

泗溪公社大搞多种经营摘掉“高产穷队”帽子

江西省上高县泗溪公社纠正正一抓粮食的偏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很快摘掉了“高产穷队”的帽子。

泗溪公社是上高县粮食生产发展较快的一个公社，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约占全县征购粮总数的五分之一。但是，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这个公社只重视粮，

忽视和放松了多种经营，结果造成农业增产不增收，社员分配不兑现，到一九七七年，全公社国家贷款多达八十万元。去年春天，他们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下决心纠正“单打一”的偏向，发动干部、社员广开生产门路，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为主的副业生产，年终全公社工业收入迅速

增加，社员分配现金收入比上年增加了十七元。多种经营的发展，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实力。去年，这个公社遇到了特大旱灾，各大队从多种经营的收入中支出部分资金购买农机、化肥。使全公社去年夺得丰收，总产量增加五百九十多万斤。今年开春，这个公社又购进了化肥，增添了农机，积极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据新华社）

错误的。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大家统一了认识：社员养马，是《六十条》规定的，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能加以干涉。“谈马色变”一事发生深思。记者在农村采访，类似的事还听到不少，诸如“谈牛色变”、“谈驴色变”、“谈蜂色变”、“谈自留地色变”等等。在“四清”横行的年月，“资本主义的棍子乱打，帽子乱扣，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被取消，弄得许多干部、社员至今还心有余悸，这是不足为怪的。问题在于今天如何帮助干部、社员狠批极左路线、肃清流毒，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前提下，把作为集体经济补充的家庭副业尽快发展起来。不要再补这补那，唯唯是问国家贫乏落后了。车坪大队采取“弄清一件事情，提高一下认识，解决几个问题”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

新华社记者 石玉生

友谊花开更姣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日代表团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的第一个樱花烂漫的春天,由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日代表团,应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邀请,从四月八日到十九日,对我国一向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

邓颖超副委员长是继邓小平副总理之后第二位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我们代表团首次向日本派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团,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到友好邻邦日本探亲访友,以增进两国领导人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特别是两国最高权力机关——我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我们代表团也是作为临时的留学生,抱着向伟大的日本人民学习的愿望,去了解日本在发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建国的。

日本朝野各界朋友早就多次邀请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日本。邓副委员长也表示接受日本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到日本访问。邓副委员长访问日本,同时也实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怀抱过的,在中日和友好条约缔结后重访日本的遗愿。日本国会、两院和广大人民,举国上下,给了我们以非常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谊而去,满载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而归,圆满地成功地完成了访问任务。

中日友好的新发展

通过十二天的访问,我们深深感到,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随着中日和友好条约的缔结,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两千年来传统友谊迸发出新的活力,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呈现着崭新的面貌。

邓副委员长拜会了天皇陛下,会晤了大平正芳首相、滩尾弘吉众议院议长、安井谦三参议院议长和福田直外相,会见了福田起夫、田中角荣两前首相以及日本朝野各政党的领导人,看望了许多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老朋友和中日友好事业先驱者的亲属,并且同日本各群众团体、经济、文化、妇女、新闻、宗教等各界朋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往,接触面非常广泛。我们同老朋友进一步加深了亲密关系,也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

热情好客的主人对我们的访问关怀备至,以破格的礼遇款待我们。日本国会各政党议员二十三人轮流交替陪同我们到各地访问,其中一位议员朋友说得好,“日本各政党在选举中是竞争的对手,但是在中日友好和接待邓副委员长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车队所到之处,大街小巷,经常遇到日本群众扶老携幼,向我们挥手欢呼,在奈良等地,每到一处参观的地方,成千成百的群众,手持中日两国国旗,夹道热烈欢迎我们。所有这些激动人的情景,使我们永远难忘。

在繁忙的访问日程中,邓副委员长还专程前往已故的众议院前议长保利茂私邸,向保利夫人及其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保利夫人感激地说,“我相信保利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保利先生的长子把他亲自作的两朵樱花标本送给邓副委员长说,“这是长在我家院中的樱花,父亲一直盼望它开花时,能由日本接待你。但遗憾的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邓副委员长激情满怀地说,“我将把这个标本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珍藏起来。”

在我们日本领导人、日本著名政治家的会晤中,双方一致认为,去年中日两国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和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把我们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对缔约后的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大平首相表示,他将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中日两国关系尽自己力量。滩尾议长指出,中日和友好条约是“加强中日两国友好基础”的条约,“在那以后的短暂时间内,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取得迅速的进展,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亲自为缔约作出决断的福田起夫前首相强调,缔约后“两国关系更紧密了。”“这为中日两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亲手签订这一条约的福田直外相说,由于缔结这项条约,“两国就成为亲戚关系了。”“今后应该不断加深两国的世代友好,这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两国的繁荣。”我们完全赞同日本朋友的这些意见。因为正如安井议长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今天动荡的世界上,不断加强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不仅对中日两国,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繁荣与和平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感到,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在这方面负有重大使命,我们愿意同日本朋友一道对此作出积极的努力。我们相信,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日本,我们两国关系一定会在条约的基础上不断前进。

正是出于对中日两国以及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考虑,日本政界、经济界和其他各界朋友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四个

日本新貌和传统文化

现代化建设表示非常关心,并且表示愿意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合作。我们代表团感谢日本朋友的好意,并且向他们阐明,我国的工作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正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作到综合平衡,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这将更有利于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日本有识之士表示理解并赞成我们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日本新貌和传统文化

我们代表团访问了具有现代特色的东京、大阪和千年古都的京都、奈良等地,参观了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游览了日本的名胜古迹,既看到了从战后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日本新貌,又看到了日本古老的传统文化。

日本是东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人民生活水平高,交通秩序和公害等问题有很大改进,人们比较注意遵守公共秩序,很讲礼貌,环境卫生搞得很好,工厂企业善于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核算,重视产品质量等等。日本在发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确实有许多长处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然而我们觉得日本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两点:第一,日本人民具有发奋图强和艰苦创业的精神;第二,日本人民勤奋好学,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他们十分注意从自己既有的传统和实际出发,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加以发展和创新,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加农照相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的朋友们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还看到,日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京都、奈良等地的名胜古迹,如唐招提寺、二条城离宫等,阅历千百年,至今完好地保存着;有些历史文物被指定为“国宝”、“重要文物”,由国家精心保护。这些历史文物、名胜古迹,不仅被用来发展旅游业,而且被用来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民族传统教育。在奈良,我们曾看到老师带领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在,在那里进行生动的历史课教学,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雅乐”,在中国已经失传,而在日本却被保存下来,从事这一音乐活动的乐师被看作“无形文物”,受到国家的尊重。日本人民生活活跃程度高,但是东方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书法、茶道等都被继承下来。

促进台湾回归祖国

在访问期间,我们还利用旅日华侨举行的茶会记者招待会和同日本朋友、华侨个别接触等各种机会,反复阐述了我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元旦发出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希望日本各界朋友,利用他们同台湾的广泛联系,为我国实现国家统一作些促进的工作。我们殷切地希望旅居日本的侨胞,利用他们所处的方便地位,更多地发挥桥梁作用,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的了解,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多作贡献。

祖国政府和全国人民对台湾同胞的亲切关怀和思念,深深地打动了参加茶会的侨胞和台湾同胞的心。一位台湾省留学生说,“邓颖超团长的亲切慰问,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罗团长的讲话,使我感到祖国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深切关怀,同时还为台湾的将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对此我百分之百的赞同。”出席这次华侨茶会的侨胞,有的是第一次同来自祖国的亲人接触,其中还有前台湾的军政人员,在茶会上,有位台湾籍侨胞把自己栽种的几盆台湾产的兰花摆在代表团就坐的桌子上,其中一盆兰花被命名为“心向祖国献红花”,它表达了台湾同胞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都是骨肉同胞。我们深信,台湾回归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访问的高潮

日本京都的岚山,是世界著名的风景胜地。我们已故的周总理六十年前到这里游览时,曾写下《雨中岚山——日本京都》等光辉诗篇,歌唱了岚山风景的美,抒发了青年周恩来寻

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凌云壮志。六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人民为了纪念中日和友好条约的缔结,缅怀周总理为发展和加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所建树的功勋,在岚山麓下的伏见公园修建了周总理诗碑,并在四月十六日,在周总理的侄孙和老战友邓颖超副委员长参加下,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这一天是我们这次访问的一个高潮,也是中日友好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北从北海道,南起九州,日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纷纷赶来参加诗碑揭幕式。他们当中有专程从东京来的八十高龄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和多年为日中友好作出贡献的黑田寿男等老朋友。参议院议长安井谦三等发来贺电。新制作座团的艺术家用,在团长真山美保的率领下,特意从东京来到庆祝诗碑落成酒会上表演中日两国歌曲。他们簇拥着邓颖超副委员长,用中国话唱起《在北京的金山上》,边唱边舞。邓副委员长也打着拍子,同他们唱和。当他们演唱《敬爱的周总理》和周总理最喜爱的《洪湖水浪打浪》时,在人们的胸中激起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中日两国朋友们悲欢交集,不少人不禁流下了热泪。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周总理创造性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为中日友好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所接触过的日本朋友、阶层之广泛、人数之众多,也是中日友好史上从未有过的。今天,他老人家辛勤劳动撒下的中日友好的种子,已经开放出绚丽夺目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他青年时代留下足迹的岚山建成的这座诗碑,将作为中日两国人民永恒友谊的象征,永远长存。一位日本朋友尾谷宗忍,为了庆祝诗碑的落成,写了两首七绝诗,诗中写道:

赫赫功勋助八垓,
丹心片语辅天来。
请看一个新碑貌,
直是金剛不坏身。

× × ×
诚信一片意无量,
殒后经年念愈扬。
常忆江南三月里,
鸂鶒啼处百花香。

要世代友好下去

我们在和日本朋友们的接触交谈中,大家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要使中日友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不仅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而且正在变成他们的实际行动。我们看到不少日本老朋友的第二代、第三代,继承了他们前辈的事业,积极为发展中日友好而努力工作。建立周总理诗碑委员会委员长吉村孝一郎和西园寺公一,都是祖孙三代来欢迎中国客人。久原房之助的孙子久原裕和夫人带着一幅中国画卷来会见邓副委员长,这幅齐白石画的,画一九五五年久原房之助八十八岁诞辰时,周总理赠送给他的。周总理亲笔在画上题了“中日友好”四个字。久原逝世后,这幅画传到他孙子手上,被当成了传家宝。在欢迎我们代表团的行列中,有大批的日本青少年,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琵琶湖畔,由天津市中央小学四十名五、六年级学生组成鼓乐队,欢乐地吹奏着迎宾曲,在奈良车站,一队少女随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乐曲,挥舞彩带,跳起迎宾舞。

这些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日本的老一辈、父母师长们已经在青少年的心灵里播下中日友好的种子,“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感情正在在日本的青少年中培育起来。松村康雄的女儿小堀吉子告诉邓副委员长:“我父亲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我的侄女在北京留学,她是第三代,我家还有上小学的,他们是第四代。我们经常教育后代要堅持中日友好。”天津市中央小学的一位女教师说:“我教育孩子们要同中国世代友好下去。”

在日本国会议员中,我们同样看到人们欢歌舞的情况:许多日本年轻的政治家们对中日友好十分积极。日本国会中昭和年代出生的议员有一个组织,叫作“昭生会”。他们在中日建交后访华时,周总理曾会见了他们,他们带着周总理同他们合影的照片赶到日本参加了周总理诗碑揭幕式。我们看到日本政治家中新生代力量正在成长。我们代表团的青年代表、和新结识的

日本青年议员互相勉励,要继承老一辈开创的中日友好事业,共同担起发展中日友好的担子。

事实使我们深信,中日友好事业是后继有人的,这样就可以永保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了使中日友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一定要大力培养千千万万的中日友好接班人,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准备迎接鉴真高僧“回国探亲”

我国唐代高僧鉴真,为了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应日本佛教界的邀请,冒着生命危险东渡日本,在中日友好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鉴真在十二年里五次开航东渡都失败了。在第五次东渡中,他因遭遇风暴,在大海里漂流了十四昼夜,最后受暴热患眼疾而致双目失明。但是他“不惜身命”,以六十五岁高龄,毅然进行了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公元七五四年胜利到达日本。鉴真把中国的文化带到日本,还带去了建筑、艺术、医药等各方面的人才。他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他凭嗅觉鉴定药物,为日本人民看病,治愈疑难杂症。他还在日本兴建寺庙,雕塑佛像。奈良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建造的。这座气势雄伟的仿唐建设,是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鉴真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所建树的业绩,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传颂。鉴真的弟子为他所塑造一座同真人一般大的干漆像,供奉在唐招提寺内。这座塑像被定为日本的“国宝”。

去年十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同意唐招提寺森本长老的请求,欢迎鉴真高僧“回国探亲”。我国有关方面正积极准备迎接鉴真高僧回国探亲。这一次我们访问唐招提寺时,森本长老再次表示了上述愿望。邓颖超副委员长表示热烈欢送。鉴真高僧偕同“回国探亲”,将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一件盛事。我们要发扬鉴真和尚那种为了两国的友好而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把中日友好关系向前推进。

樱花荷花情谊长

美丽的樱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早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赠送了一棵大樱花树给中国。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纪念。这批被分别栽种在北京、上海、杭州和西安的樱花树苗,已经在中国的土壤上扎下了根,茁壮成长。这次我们访日时,邓副委员长带去了日本天坛斋宫待放的樱花的彩色照片,赠送给大平首相和田中前首相等日本朋友。邓副委员长对大平首相说,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就象樱花一样,先开放满树花枝,然后抽芽长叶,以至枝叶茂盛,中日两国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为欢迎邓副委员长和大平首相总理,在我们访日期间,日本朋友又多次用鲜花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良好感情。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雄,特选制造有樱花的“七宝烧”一种类似中国景泰蓝的日本工艺品,并置备有樱花图案的座钟赠送给邓副委员长。竹入说,“樱花是日本国花,有着深远的传统,把这两件礼品送给你,像‘樱花信’。田中角荣前首相在会见邓副委员长时表示,为了使中日两国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他将赠送给中国一株染井吉野樱花树苗,并且说:“如果这些树苗种植在周恩来总理的家乡,我感到无比高兴。”我们准备把这种标志日本朋友友谊的樱花树苗分别栽植在招徕、淮安、南京、重庆、天津等这些周恩来总理战斗过的地方。

在唐招提寺御影堂的庭院里,我们欣赏了长得郁郁葱葱的松树枝,牡丹和芍药,它们都是中国佛教代表团一九六三年访问日本时送给日本朋友的。更吸引我们的,是那里种植的“日中友谊莲”。这种莲花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已故的莲花博士大贺一郎先生,在日本千叶县发现了两千年的古莲子,把它培育成“大贺莲”,并在一九六三年把“大贺莲”种子赠送给中国。中国朋友又把“大贺莲”中国古莲子培育出来的莲花进行杂交,从而培育出一种新的莲花品种,取名“中日友谊莲”,并且回赠给大贺先生的学生大贺二经。经过长期的精心培育,“中日友谊莲”在日本开出了粉红色的花,被命名为“日中友谊莲”,种植在唐招提寺。后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栽种“中日友谊莲”的植物园遭到破坏,中国的“中日友谊莲”随之灭绝。这次日本新闻说邓副委员长来唐招提寺参观,特地赶来,赠送“日中友谊莲”的藕根,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已将它取走,准备精心栽培,使“中日友谊莲”重新开放出鲜艳的花枝,飘洒出友谊的芬芳。

我们的访问是短暂的,但是中日两国的友谊是长存的。我们愿意同日本各界朋友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把伟大的中日友好事业长期地持久地发展下去,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继续共同努力奋斗。

福建省东山县委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做好华侨归侨阶级成份的复查工作和归侨、侨眷中的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工作,调动了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建设家乡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东山县是福建省著名的海岛侨乡之一。全县旅居国外的侨胞达三万多人,占全县现有居民的五分之一。由于各级党政组织的重视,党的侨务政策在这里落实得较快较好。全县华侨中的地主、富农和错划阶级成份的共八十三户,经过复查,这些侨户的阶级成份全部得到改变或改正。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全县有成百名归侨、侨眷因“海外关系”或长期侨居工作而被加上“特务”、“叛徒”等罪名,遭受迫害。对这些冤案、假案、错案,县委和有关部门都进行了复查,坚决予以平反,使受害者及其家属感到党的侨务政策的温暖。东山县委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激发了海外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回国探亲汇款参加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广大归侨、侨眷也积极地投入了家乡的生产建设。(据新华社)

我国将首次发行精装纪念币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一套精装纪念币。这套纪念币共四枚,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字样和“1949—1979”年号;背面图案分别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这套即将发行的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发行的第一套纪念币,现正精工铸造。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这套金币将向全世界发售,发售时间另行公布,有关在国内外和港澳地区发售事宜,可向香港宝生银行询问。(新华社)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京都二条城庭园内,观赏樱花。



邓颖超副委员长参观唐招提寺时,受到幼儿园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在欢迎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日代表团队伍中的日本儿童。



京都车站自发组织的欢迎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日代表团的群众队伍。

